

未完的 人生大杂文

耿庸◎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未完的人生大杂文

耿 庸



上海远东出版社

未完的人生大杂文

耿庸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光商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4 1/32 印张 7.5 字数 165000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80613-223-6/G·394 定价:12.00元

心中的纪念碑(代序)

写一本书,对于从事写作和编书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然而,作者的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虽然不是作者的我却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不仅因为我曾抄写了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对其中的文字有着特别的感情,还因为这本书与作者的前一本书的出版时间相隔了五年,这也正是我们——我和作者——的共同生活历经艰难走出困境的几年。

“你有一年多没写什么了。”

这是六年前,我和耿庸旅居广州时,他的一位友情至深的朋友在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几年来,这一句在写信人也许只是随手写来的话,我却始终不能忘记。因为它道明了我们当时面对现实感到最为无奈和遗憾的事。

何止是一年。

在我和耿庸结婚至今的七八年时间中,有远不止一年的时间,我们几乎失去了能够正常工作的条件。婚姻虽只是“个人问题”,却常因为有背世俗的成见而使当事人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非议,甚至破坏。从我们决定一起生活开始,就注定我们无法避免这一切。只因为他已不年轻,而我却太年轻,尽管这对于我们并不成为障碍。

曾有不少好心或不好心的人对我们的婚姻作过令人畏惧(甚至可以说是恐惧)的断言,我相信作出这类断言的人都有着

他们认为十分合乎逻辑的理由。然而，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们想象的逻辑却不一定都相一致。我们曾因缺乏财力而陷于生活的困境；也曾因一次次疾病的袭击而使彼此多添一份担忧。然而，这并不是我感到最“痛苦”的事，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生活的难题。我们不是那种“从不脸红”的夫妻，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烦恼，有许多的忧虑，甚至有很深的痛苦，然而这些却都不是如一些预言者所断言的，由于我们彼此存有必然的隔阂或有无法克服的障碍，而都是因为面对外来的种种纷扰而感到的无奈。人不得不为了排除这种种纷扰而无谓地消耗生命，是最令人痛心的。这种无谓的消耗对于我是一种损失，对于已经被损失了二十五年的他来说更是加倍的损失。

作者在乎反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他的杂文集《回收集》。那时，胡风案早已得到平反，当时，他除了恢复了名誉并重新获得了自由之外，似乎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荣誉”正随之而来。然而，也就在这时候，他作了一个许多人为之不解的决定：尽早离休——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一个已被损失了二十五年的人太珍惜自己的创作生命了。

然而，写作对于他尽管是如此重要的工作，却已经不像以往那么轻松了，而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我记得，他在当时给我的信中有过这样的话：“我现在的思路常常就像一条被切断的蚯蚓，每一段都是活的，但却似乎无法把它们连结起来。”……“昨天写的东西，今天就没能接下去，只能撕掉重来。”……我感到这些言语中有着执著、无奈又不甘屈服的复杂的情感。也因为如此，直到我们已经结婚多年的今天，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在他正在工作时，忽然有人按响了门铃。也因为如此，即使在我们终

于有了一份安定的独立的生活之后，我仍然会在日常的生活中心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以往的损失所感到的遗憾。

在我们结婚四五年以后，生活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得以改变了居住上的困境，还有了一间可以容得下两张书桌的书房。一九九三年以后，我们终于有了一份完全独立的生活。人能够拥有一份安宁，并在这安宁中做自己想做的事，真是多么幸福。这份安宁，使我可以全心投入工作，这份安宁，使他在一年里写完了本书中大部分内容。我为此感到欣慰。

尽管作者“不喜欢回忆往事”，尽管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他不常谈到往事，尤其是过去的生活里的琐事——我们倒是不少谈现在或以后的打算，哪怕是不太合乎实际的打算——而这本书所写的恰恰可以说都是往事，是那些即使不想回忆也不会忘却的往事。不喜欢回忆，不是因为过去的事有着太多的不幸和坎坷而不堪回首，而是不想把思想和感情停留在过去，不想用对过去的回忆来填补今天和未来的生活。人不能为过去而谈过去，但应该为今天和将来重新审视和反思过去。我想，因此才有了这本书的诞生。

这本书所写的是那些已故的曾在文坛上留下足印的人的人生经历；是对在特殊的年代中人的命运和心灵的片断记录；是有关自己亲密的朋友的人生的命运、有关自己家庭的不幸和幸福、有关自己一生事业和生活的命运的故事。是作者用文字描述出来的心中的纪念碑。

几年前，还在广州居住的时候，一位一直热情帮助我们的医生教授有一天不无感叹地说，他失去（去世）一个朋友，就在通讯录中划去这个名字。几年中，他的通讯录中已经划了很多

这样的线条，而且他这几年常参加追悼会，有时甚至同一天参加两个追悼会，“刚在这里鞠躬，又到那里鞠躬”。

花圈、悼词、鞠躬，这是现代的中国人对每一个死者的所采用的相同的悼念方式。

我有时会有这样的疑惑，那些在追悼会上在统一的号令之下一齐鞠躬的人们是否都为悼念死者而来。我在一年多前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参加过一个出版界人士的追悼会。我未敢去看望我平日十分敬重的死者的妻子，因为我担心自己见到她便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在大厅的一排排花圈之前感到一种难言的抑郁。也就在这种场合，居然两次有熟人看见我因是久别相见而热心地问着我的近况，使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所以，我不愿意参加追悼会。”耿庸说。

这是为了更真实的纪念。

尽管这几年每年都会收到甚至不止一张的讣告，但他很少去参加追悼会。想回避的不是那种氛围所必然引起的感情刺激，不是因为朋友去世了就了却了对这朋友的感情，而是不愿目睹自己的朋友以已经死亡的形象展示在众人甚至与死者并无情意的人的面前，不愿意看到死者的亲属在如此众多的人群之中与自己的亲人作最后的生死离别。——虽然朋友的离去总是令人伤感的事，这种伤感有时又是十分十分强烈的。

1987年12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我一踏进耿庸的那间小书房，就感到有一种异常的气氛。果然，他好像刚从幻觉里走出来似地对我说：“就刚才，S夫人打电话来说，姜椿芳去世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的腿都软了。”他又说，然后，他坐回到藤椅上，一口一口猛吸着烟，我沉默着坐在他身旁。我能够

感觉到这个消息对于他情绪上的影响，但我却不善于说安慰的话。——过了很久，他转过脸看着我：“我的朋友一个个离去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年，但这一情形依然清晰地在我眼前。我想是因为当时那种真切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而这种感情不仅仅是朋友的情意，还有经历了深重磨难之后重新有了工作的权利，而生命却这么快就结束的现实给人的遗憾。这种感情也许在同受过难的友人中间更为深切。也是这种感情将这里的文字铸成了心里的一座座故人的纪念碑。

几年前，有人问过我一个在我看来很是奇怪的问题，他（耿庸）现在的文章都还是自己写吗？我当时颇有不解，回答说：“当然是自己写。”不是自己写难道还请人代写？以后，大约也就是去年，有一位他的朋友向我建议说，常备一个小录音机，把他平时随意说的一些议论或往事录下来，或者是他想起什么与要写的文章有关的内容就让他立即对着录音机讲，然后由身为编辑的我根据录音来整理。这个当属“合理化”的建议虽然至今未被采用，我却因此明白了那个是不是自己写的问题的意思。看来这种做法并不是新鲜的了。我们倒是也认真地考虑过他的那位朋友的建议。尽管我们很喜欢在一起谈话，我们甚至下决心要把面对面的两张书桌分别放在两间屋里，以免因为即兴而起的谈话影响了写作，但最终还是只能搬到了一起，因为我们只能过去合用一台电扇、现在合用一台空调。我觉得，有时随意的谈话比做成一篇文章更令人愉快。但我们对于借助录音机而进行合作却没有信心。耿庸认为叫他对着录音机讲话，只能使他的尽管被切断但毕竟还是活的思路变成死的；而我则认为，要我来把

“切断的蚯蚓”接成一个整体，恐怕免不了会把这条“蚯蚓”的头接上另一条“蚯蚓”的身体，终究使活着的“蚯蚓”段虽然组成了一个整体却已不是原来那条“蚯蚓”，即使是也可能失去了其生命力。一个人所思考过的事所感受过的事唯有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才最为现实也最为真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字表达的习惯，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是不能替代的。

虽然我没有尝试去做连接“蚯蚓”的工作，但这本书中的文章除了发表较早的《绀弩片记》、《傅东华二三事》等之外，我抄写了其余的大部分文字。开始是用笔抄，以后则用文字处理机打印。我无疑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从这些文字中熟悉了那些原来陌生的人，有感动，也有遗憾。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篇篇幅达两万多字的《枝蔓丛丛的回忆》，我在抄写这篇原稿的时候，曾几次为内容所感动而不得不中断抄写的工作。我感到在这些未加渲染的文字中蕴含着一种真实而具有感染力的感情从而给文字增加了魅力。

我因此相信，那些活着的“蚯蚓”依然都是活的，而且并没有被切断。我这么说，也许是由于像有人所说的“感情色彩”。如果真是这样，倒也未必不是一件美好的事。

路 莘

1995年7月

目 录

心中的纪念碑(代序)

路 莘

回忆黎烈文1

“文学本来是每个人的事情，形成了一个文坛，文人就在大社会里添加了一个小社会，好像旧戏里说的‘大圈圈里还有小圈圈’，于是越在里面越局促，周围都是一碰上就摔不开的苍蝇一样恼人的麻烦。鲁迅为什么产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感慨?……”

许寿裳先生之死27

许先生决不是糊里糊涂牺牲了的。他的凶手们愿意称呼自己为“小偷”，他们就在这个意义上以凶狠的政治扒窃集团自喻了。

傅东华二三事31

监管“牛鬼蛇神”的不成文“约法×章”订得那么具体而微，让人联想到一篇与僮奴订约的古文。然而“牛棚”中人或以为不可等闲视之，或暗暗等闲视之，多半是能敷衍得过便敷衍了之，也自然有对之兢兢业业的忠厚过头人。其时发生了一桩小事，事主就是傅东华。

姜椿芳这个真人43

老姜去世已经好几年了，每当我想起对老姜说过“人一走，茶就凉”这话不对，人走了，茶该倒掉之类的痛了他的心的话，一份负疚感倍加沉重。

想起了吴强47

“一瞑之后，人言两亡”，连各样的议论也不能有所知——即使是讣告和悼词里的动听言词悦目文字。我这时趁着吴强逝世第五个年头写了这么些不可能复活吴强来审读核对的关于他的故事，也情同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还把他要我别说出去的话和劝我别做的事都说了和做了。我相信，他活着也不会责备我的，我只能等待着非他的责备。

小记姚奔63

受着癌症折磨的他艰难地写下了两首遗诗：“我从人间消失/回到永恒的自然/在元素的家族里/以另一种形式默默地奉献”，这分明传达一种不灭的信念：奉献自己给人世间的他的人生意志依然在持续。

缘份虽薄，仍难忘秦似.....67

他站在路边对我说：“你是确信往事不堪回首，还是你认识不到悲剧人生的历史价值。希望你想想。”我觉得这对我不是问题。人间的悲剧人物不知有多少，就算我一个，即使和绀弩比起来，也已经微不足道了；而有的人物的悲剧却原来是用沾血的花环装饰起来的丑剧，这总该分辨分辨。

不能不说秦牧81

这阵雨淋得我心里好痛快。我知道了，秦牧请我吃饭，我为什么偏不。这虽然不过是我在当时情况下的一种情绪反应，却还是有潜在这情绪里的意识内容的，这就是，秦牧和我多分不会再谈什么内心矛盾的话了。当然，这并没有伤害我们友谊的一丝一毫。

怀念高放101

“巴尔扎克真能用笔做到拿破仑用剑做不到的事吗？不见得。不！不！绝对见得。剑是征服不了心灵的。”

的确是萧军113

他重重地捶击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缄默一阵之后，从胡风的人生悲剧说到了绀弩和雪峰的人生悲剧。他甚至说到他和我“因为是小角色，算是走出悲剧，也许不过是在悲剧里换了些台词”。

绀弩片记125

绀弩真是大杂文家，非但其所作杂文称得起杂文，也非但其旧体诗是杂文的诗、诗的杂文，还连他这个人也是岸然的一首杂文。他以“人”完成一篇独特的人生大杂文。

满涛片记133

幻想、希望、信念，可以说是受难的正直人在狂乱而贫弱的那些春秋里面勇于执着生活的内在的激素。但我提起“文学的幻想”，无非是向别林斯基的译者问个好罢了。

却说张中晓139

二十多年过去了，算是高龄人的我认为不能为了遵从中晓的嘱咐把纵然是“死亡浪漫主义”的故事埋在我心底直到永远地埋没。我于是说出来，我还要接着说出我所了解的中晓的包括心灵活动在内的生活故事——为了文学的前进而夭亡在受难里的一个普通人的生点滴——我以为都是不能埋没的。

写在阿垅《第一击》后面165

“阿垅”这个名字成为超过四分之一世纪过程中他的痛苦和安慰的集中表现的定名。“阿垅”，较之他的别的名字更能在人们对他的认识中呈现他的晶洁的、正直的人格。

枝蔓丛丛的回忆183

“这一幕让你体验到了文学界里的非文学的或文学以外的风气”……我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她。我的书生气十足的乐观惩罚了我自己。“过两天就回来”的自信无情地变成了绝对和永远的谎言……要记录下来的往事还有许许多多，在这不像文章的文章的每一个标题下文字的末了都得加上两个字：未完。

附 录

本书中人物简介219

回忆黎烈文

“文学本来是每个人的事情，形成了一个文坛，文人就在大社会里添加了一个小社会，好像旧戏里说的‘大圈圈里还有小圈圈’，于是越在里面越局促，周围都是一碰上就摔不开的苍蝇一样恼人的麻烦。鲁迅为什么产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感慨？……”

听说沉名已久、既成古人也有二三十年了的曾为《礼拜六》主编之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于今忽又声名鹊起，便——大抵势所必至吧——立即记起来了超一甲子以前从这个礼拜六派人接过来加以改弦易辙、除旧布新的《申报·自由谈》的主编人黎烈文。

听来的几个故事

我知道有一个黎烈文却并非看过《自由谈》。最初知道这个人是从鲁迅的《伪自由书》，随后则从《译文》和《中流》以及J·罗曼的《医学的胜利》、A·法朗士的《企鹅岛》、P·洛蒂（原译似是“罗迦”）的《冰岛渔夫》和《梅里美选集》；中间还从《作家》或《中流》看到十二个作家抬鲁迅先生灵柩照片里模糊的黎烈文形象。那时期，我还是个才从教科书里读到“好读书不求甚解”便颞颥地引以为一种信条的少年。直到四五年后，即1940—1941年，我在桂林和建瓯，陆续又读了他翻译的泰纳的《红萝卜须》、巴尔扎克的《乡下医生》、纪德等人合集的《邂逅草》、不记得作者名字了的《期待之岛》和不记得书名了的莫泊桑的小说，还重读了正是“西装革履”了的《世界文库》单行本的《冰岛渔夫》，才凭着浅薄的文学知识，对作为翻译家的黎烈文有一个虽然未定的——说夸大些——认识，即是，他似乎有什么就翻译什么地把

三个基本文学派别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不加区别和选择地翻译过来，似乎他没有确定的文学思想立场。但这又有好处，即对于什么翻译作品都想读的人来说是正合需要的，不仅是单从他翻译的作品会就能获得一种比较和辨别派别不同的文学思想、方法和风格的方便，也许这正是他从事翻译的旨意吧。……

1941年3月间，我匆匆从建瓯出走，准备要去桂林，路过永安时留住了三四天。一天，摆脱不了久不相见了，在黎烈文当社长的改进出版社工作的同学，十六岁就出版诗集《星之歌》的郭英的好意，被他和他的同事、写小说的姚隼带着，徒步到七里外的蛤蟆村他们编辑部去吃“草包饭”。战时福建省会的这个小城郊外早上的太阳仿佛发了霉，一副又愧赧又沉郁又歉疚的情态。这或许由于旅费难筹而情绪不好的我又听说他们出版社社址在城里的污沟街而觉得他们以至他们出版社倒霉在龌龊里的缘故。事实上，我想说句“黎烈文和你们准是想吃天鹅肉，想要做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莲”的笑话也说不出。直到郭英打了一下我的胳膊，说“你怎么啦，告诉你两遍我们就到啦你都不响”，姚隼跟着问：“你听见了什么吗？”我摇摇头。姚又问：“你在报馆里工作，没有听过印刷机响吗？”我这才听见了“咯哒咯哒”的印刷机的哭叫，却回了他们一句“你们大概初入鲍鱼之肆，听那破机器的声音响像听漂亮的女高音”，说出了也就觉得无聊。这唯一一次的蛤蟆村之行也真的是无聊，只除了我认为是无稽之谈却又无从反驳的两桩事还有点——怎么说呢——没意思的意思。这两桩事之一是，郭英说，社长黎烈文规定，谁找他都不许敲更不许擅自推开哪怕一小条缝儿他的办公室的门，都须在门

外喊“报告”，须听他叫“进来”才可以推门进去。我不信，我认为把黎烈文说得像是打足官气的部队长，是郭英吃多了草包饭吃得人也变成“草包”了的卤莽瞎扯。可是姚隼肯定郭英说的是事实，郭英还说“他这个规定其实很好，人家有要紧事也不找他了，等到看到他在外边再说”。这越发是“草包”话。我想“将”死他的“军”，问了“雨田去找他呢”，郭英答：“不知道，没有看见过。倒是有一次看见王西彦敲他几下门说了一句‘我是西彦’。”我看看姚隼，姚隼不能作证明人了，说他没看到过。但他立即说出了“这里有许多人都知道的”另一桩事：“有个晚上，王西彦和黎烈文关在房间里号啕大哭。住在这里的人都听见了，就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总之，一件奇事。”我问郭英，郭英说他那时还没来，后来听说过。我于是说：倘若这都是真事，那么，我想黎烈文这人的感情态度大抵是坚实而明朗的，无论表现为冷峻还是表现为热烈。

1943年夏季，我在永安《大成报》工作了一段日子，偶尔听先前高年级同学、在改进出版社编《现代青年》的赵家欣说起，黎烈文已和许粤华（雨田）结了婚。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大约两个月，重庆的“秋老虎”放肆肆虐的日子里，我工作所在的《新中华》杂志编辑部从市内热闹的督邮街搬迁到郊外冷静的李子坝中华书局编辑所那座楼里。我也住到那里的集体宿舍里了。不知怎么，住在这楼上一个房间的编辑所所长金兆梓先生似乎特别和我“有缘”（这话是编辑所的张先达说的）：天天，无论我坐在哪个位子上，坐在固定位子上的金先生总是面向着我说话。他那金华语音的普通话使我连听带猜也懂不了他所说的大抵是文史掌故的话的一半。